

21 世纪：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文/林毅夫 胡书东

京师大学堂在1898年设立,严复作为首任校长主持工作之时,就开设了经济学课程,聘请日本教师教授,及至严复翻译的《国富论》出版,中国经济学学科的近代化进程加速。北京大学于1912年设立了中国最早的经济学科——商学科。同时陆续有不少学生负笈欧美,学习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译介也更为全面,出版了不少经济学原理、财政金融、经济学说史等方面的

早在 1867 年北京同文馆就开设“富国策”课程，

书。伴随西方经济学的传播,围绕中国的若干现实经济问题,也有不少著述,仁智之见交相迭出。

从19世纪80年代到“五四”运动前夕的40年中,中国出版了40部左右的经济学著作。从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原富》到辛亥革命为止,中国出版了大约十六七部经济学著作,主要是翻译西方和日本的经济著作,并且以译自日本的为多,这反映了1905年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激增和日本对中国影响的上升。当然,这期间也出现了几本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经济学著作,比如1910年出版的《调查户口章程释义》(陶保霖著)、1911年出版的《中国国债史》(梁启超著)、1911年出版的《比较预算制度论》(吴琮编著)。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期间,又有近20本经济学著作出版,其中中国人自编的著作约占三分之二,多属财政金融类,这说明经济学当时在中国的普及速度是比较快的。译本则绝大多数来自日文著作。在1902年以前的译本大都用文言文意译而成,对原书内容多有省略,且常运用我国传统的旧经济概念与术语来附会经济学,更使人难以理解原著的真正含义。从1902年以后,这类情况有所改进。随着日本经济学书籍的大量译介,中文的经济学专业术语也大量采用日文译法,中文经济学概念体系开始建立。当然,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学仍然处于引进阶段,所谓国人自编的经济学著作,基本上就是外文著作的翻译整理,没有什么创新。

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这之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民族资本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1914年到1919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工厂数量从698个发展到1759个,增加了157.7%;资本从3.3亿元增加到5亿元,提高了54.5%。新增加的资本额超过辛亥革命前四五十年投资的总额。“五四”运动之后至20世纪50年代期间,中国经受了日本侵略、国内战争、资本主义大危机等冲击,一方面经济有所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当中的沉痾积弊并没有消除。无论袁世凯及其继任者的北洋军阀还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都采取了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条件。这个期间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时期,工业化水平和资本积累都有比较大的提高。

“五四”运动之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有两条线索。许多留学欧美的学者,接受了

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回国后积极传播欧美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旧中国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迅速地在中国传播。前苏联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取得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工业化成就。这样的事实对于以救亡图强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时国内的以西方经济思想为主要理论倾向的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经济学的初步繁荣： 30、40年代中国的折射

基本理论的掌握为系统分析现实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两方面的学者紧密结合中国现实展开研究,现代意义的中国本土经济学由是发端。从“五四”运动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先后就几个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争论。第一,1919-1927年期间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第二,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有关,在30年代围绕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也在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以及要不要进行土地革命;第三,30年代,针对中国货币制度存在的问题,就货币本位展开了争论。

承继“五四”运动之前已有之势,国内逐渐开始真正系统、全面地掌握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国内学者围绕基本经济学理论、部门经济学以及经济史等所撰写的著作大量出版。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1923年马寅初和刘大钧一道发起成立“中国经济学社”,并长期担任社长。他撰写了许多经济学著作,其《经济学概论》是解放前流行的经济学原理著作。部门经济学也有长足进步。

胡寄窗老先生曾经对“五四”运动以后至1949年期间中国国内翻译和自编撰写的经济学书籍进行了统计研究。从中可以看出1929年以后中国经济学的初步繁荣情况。这一时期之所以有这么多中文经济学著作问世,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息息相关。1928-1936年是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开始出现工业的初步迹象,加上抗日战争对国防经济建设的需要,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也在经济发展方面做

出了一定的努力,“实业救国”一时蔚然成风,经济学当然就有了传播和发展的土壤。经济学译著以30年代最多,其中1930年一年出版了63本译著。从国别构成看,到30年代为止,由日文翻译而来的经济学著作虽然在数量上仍比以前有较大增加,但是已经不能像20世纪前10年那样高度垄断,其相对的重要性则已经大大下降。相反,西文原著翻译过来的已经大大超过了日文。这说明我国经济学界已经不再满足于翻译由西方贩运来的日文二手货,也说明由欧美返国的经济学家增多,逐渐支配了大学讲坛。

30、40年代经济学的繁荣还体现在专门性的经济学刊物的创办上。据胡寄窗先生估计,除了统计期刊外,1919年到1949年各类经济期刊约为112种,其中20年代有10种,30年代48种,40年代53种。不过这些刊物创刊后一年内就停刊的在半数以上,能维持一两年之久就很难得了。这说明我国经济学研究队伍仍然很弱小,社会对经济学的关注和支持仍然是很有限的。在为数不多能够长期支撑下来的经济期刊中,属于一般经济理论探讨方面的,以在上海的中国经济学社1930年创刊的《经济学季刊》成绩最为显著,一直维持到抗战前夕,是当时全国多数经济学家支持、认可的经济刊物。

在30年代,学界围绕中国本土的货币本位问题发生过争论。国民政府于1935年实行法币改革,放弃银本位制,代之以金汇兑本位制。在这个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关于中国的货币本位问题,有人主张实行多商品的本位制,有人主张实行金本位,有人主张维持银本位。围绕这些问题,马寅初、杨荫溥、刘大钧等经济学家都先后发表看法,产生了一些理论著作。如马寅初(1937)的《中国之新金融政策》、杨荫溥(1936)的《中国金融研究》、刘大钧(1934)的《我国币制问题》等。

另一个广为关注的本土经济问题是“经济建设”与工业化。1928-1937年期间,国民政府在工业化方面的政策稍见成效。抗战爆发后,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了国家的富强,奋力探索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途径。张培刚教授的著作《农业与工业化》在全面探讨了工业化的定义、工业发展与农业改革的关系、工业和农业的平衡以及农业国和工业国的关系问题之后,就中国工业化面临的急迫问题进行了分析。

解放前一大批中国学者在农村经济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堪称中国本土经

济学的杰出代表。这其中比较有特殊的历史原因。解放前中国是典型的落后农业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只有准确把握中国农村的情况,才能全面把握中国的经济全貌。著名学者陈翰笙1928年受聘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在他的主持下进行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农村经济调查。1933年陈翰笙发起成立了有500多名会员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担任第一届理事会主席。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于30年代曾就中国农村和农业经济问题,与几方面的理论观点进行了争论。同时,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还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经济学家,比如后来名噪一时的孙冶方、薛暮桥、钱俊瑞、许涤新等,都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有不浅的渊源。此外,南开大学的何廉、方显廷等人也对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何廉还被誉为中国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著有《中国农村之经济建设》。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经济学在中国已经走出了单纯的学习、普及阶段,出现了一批既掌握先进经济学理论,同时又能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中国学者。总结解放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凡是在学术上有重要成就的中国经济学家,几乎全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刘大钧、马寅初、何廉、方显廷被称为中国三四十年代的四大经济学家,享誉国内外。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国外接受过严格、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同时又都怀着强烈的救国救民意识,努力用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当时的中国本土经济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正如马寅初所说:“如果只研究理论,试问对于今日的中国,实际上有什么好处呢?”

早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就开始在中国零星传播。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则在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是最早向国内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中国现实问题的理论家。1930年之前,先后有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和译著出版,也有不少关于《资本论》有关专题的介绍。在积极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同时,不少中国学者也在勉力进行本土化的尝试。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该书自1934年北平经济学社初版起至1947年共发行了11版,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是销行最广的一部,其社会影响可见一斑。王亚南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著作最丰富的一位,《中国经济原论》是其代表作。

经济学的发展: 经济发展的孪生兄

社会科学的理论本质上是一个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逻辑体系。一般来说,解释的现象越重要,理论的影响也就越大。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是英国经济。生活在英国的经济学家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英国成为当时世界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心,著名经济学家多出于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重心逐渐转移到美国,经济理论研究中心和著名经济学家的产生地也就逐渐随之转移到美国。

自1920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成立开始系统搜集宏观经济数据,以及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经济分析的基础》一书以后,国际上经济学的发展已经开始大踏步朝向实证化、数理化方向发展。然而,中国的经济学自1949年开始,随着国土和政治的分裂而走了不同的道路。有些经济学家随着国民党政府搬迁到台湾,在台湾大学、政治大学等学校继续教授现代经济学;有些则漂泊海外,当中一些人对国民党政府在台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不少影响;也有如蒋硕杰、费景汉、张五常、邹至庄、刘遵义、李龙飞、萧政等一些新、老经济学家在货币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领域在国际经济学界崭露头角。

大陆本身则走向了另外一种发展方向。自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中国经济体制就开始全面向计划经济转轨,自从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除了继续翻译出版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围绕总路线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下的工业化成为经济理论界研究的核心内容。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一条快速实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国家领导人优先考虑的对象,也自然成为经济学界的中心工作。在计划经济时代,整个社会

生活泛政治化,特别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经济学研究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前,经济学研究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普及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二是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寻找支持现行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理论根据,并对后者加以诠释,增强其在理论上的合法性。

这一时期经济学界比较著名的理论争论有三起,即50年代后期围绕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争论,50年代末、60年代初围绕李平心“生产力理论”的争论,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围绕价值规律和孙冶方价值规律论展开的争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核心观点是主张人口增长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反对人口盲目增长。本来无论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能推出这一结论,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马寅初及其“新人口论”受到批判,与马寅初持相同观点的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吴景超甚至被批判为“帝国主义的走卒”。李平心的“生产力理论”核心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框架内强调生产力的重要性,将生产力的“社会联系”看成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在那个特别强调生产关系的年代,这一点被批判为将生产关系当成生产力的附庸。至于围绕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引发的争论,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理论和意识与不能取消商品和货币关系的社会经济现实之间矛盾冲突在学术领域的反映。对孙冶方的批判,只是因为他坚持价值规律高于计划规律,与毛泽东等领导人强调计划规律高于一切相冲突。用今天的标准看,50、60年代发生的三大理论争论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或被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从学术上讲,基本上都属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诠释上的分歧。“文化大革命”十年是非颠倒,经济学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一部分经济学家秉承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以论证和诠释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为职志,特别是努力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为改革开放寻求理论支持。公允地说,这些研究虽然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但是针对性很强,在一定时期确实起到了从理论上证明改革开放合法性的作用。另外还有一部分经济学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知识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眼界也大大拓宽,而且随着中外经济学学术交流的迅速

扩大,现代西方经济学文献大量流入中国,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们从中受益颇多,有的还留学海外,纯粹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圭臬的年轻学者基本上没有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越来越成为时尚。随着西方经济学的重新普及,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并呈逐渐增多之势。他们的研究同样对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特别是90年代以后,许多改革措施都凝聚着他们的智慧。而且,即使是老一辈经济学家,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影响,墨守传统理论的已不多见了。

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将随之提高,而当中国经济在下个世纪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经济的时候,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转移到中国来。实际上,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甚至断言,谁能成功地解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奖。以世界上最早出版并且最权威的七个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经济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经济和统计学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 Statistics)为例,它们在70年代总共发表主题是中国问题、或者主题不是中国问题但涉及到中国问题的文章数为78篇,80年代为82篇,而90年代就增长到134篇。

在60年代中期以前,华人学者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是很少的。以后随着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崛起,到国外留学研习经济学的华人越来越多,华人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开始上升。80年代以后,随着大陆对外开放,到海外留学的华人更多,华人经济学家队伍不断壮大,因而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也就进一步提高了。十分可喜的是,已经有一部分华人经济学家开始在国际学术界崭露头角,有的还是以研究中国本土问题见长。可以预期,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的国内经济学界将来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会越来越大。

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经济学传入中国已经100年了,回眸百年令人感慨万千!“五四”运动前的中国经济学发展实际处于起步阶段,社会的重视程度也很有限。“五四”运动以后,国外社会科学思潮纷纷进入中国,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分支的经济学迎合了国内实业救国的需要,也在知识分子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在30年代,经济学在中国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那时的中国政局较为平静,资本主义经济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之学,第一次卷入了中国现实经济生活之中,并产生了一定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一段较为曲折的历程,从研究范围到研究方法都受到了很大的局限,而使现代经济学在大陆的正常发展中断了。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大陆重新开始普及,并在年轻一代取得主流地位,出现了迅速弥补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的趋势。然而,由于长期封闭落后,在短短10年、20年的时间里既要消化国际经济学界过去几十年、几百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又要努力追踪其发展前沿,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难免不走弯路。比如照抄照搬国外理论,而忽视了任何理论的分析都以特定的制度和发展阶段为前提;或以概念代替逻辑分析和经验实证,理论争论常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争论等。尤其,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下,整个社会出现失序、浮躁、急于求成的风气,一些经济学者也受其影响,发表的论文和著作经常出现抄袭和缺乏深入的逻辑分析、经验实证等现象。

总结我国百年来的经济学发展,国人自撰的出版物大多属于述而不作的性质,真正的理论创新少,介绍国外理论或以国外现成理论为框架研究中国问题或就事论事地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占绝对大多数。按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建立严谨的逻辑体系并以实证资料对理论推论进行严谨的经验检验的研究和著作还不多见。后者是我国经济学研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做贡献并同时国际经济理论发展做贡献的必由之径。只要在研究规范上自觉改进,随着21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致力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必然能迎来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